

湖南人民出版社

应国斌 著

芷兰春秋

沅澧流域古文化研究



芷兰春秋

沅澧流域古文化研究

应国斌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章红立
装帧设计: 胡薇薇

芷兰春秋

——沅澧流域古文化研究
应国斌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常德滨湖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1998年 8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开本: 850X1168 1/32 印张: 22
字数: 525, 000 印数: 1-3,000

ISBN7-5438-1780-2
K·326 定价: 28.50元

序

吴定宪

我很乐意为应国斌同志创作的《芷兰春秋》写序。这是一部很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正式出版，无论是对于宣传常德、扩大常德的知名度，还是对于提高一个地方的文化品位、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祝贺这部著作正式出版，并向全社会推介这部著作。

应国斌同志写作此书历时两年，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将大部分文章打印后送请有关人士阅读，征求意见。我不仅有他打印的单篇文章，也有作者送来的装订成册的两大本打印稿。开始我并不以为然，阅读几篇以后，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告诉作者，我将他写的《武陵人文考丛》（初名）放在案头显眼的地方，一有空闲就翻阅。我还曾就书中有关的内容与应国斌同志交换意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最近几年，常德市委、市政府抓了几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如修建常德博物馆和中国常德诗墙，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将应国斌同志创作的《芷兰春秋》也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建设，给予鼓励和支持。我认为研究沅澧流域的古代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常德是一个有着优秀的人文层积的湖湘大市，但至今我们在这方面的发掘和宣传还很不够。一个地方的建设应该以教育为长

策，以文化相标帜，这是当今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是当代人应负的责任。应国斌同志对此给予关注，辛勤笔耕，其情可嘉，其功可颂。

《芷兰春秋》以善、德为主线，分名贤、名宦、名僧、名胜四篇，对常德历史上有影响的人和事，包括人文景观、民间传说以及考古发现等进行精心梳理和考证，并运用生动流畅的语言叙述它们的文化价值。全书主题突出，脉络清晰。

崇尚道德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常德暨沅澧流域传统文化的精髓。作者在书中突出了这一重点。常德有善卷先生的传说，有以善德命名的德山，这是常德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其后一大批名贤、名宦，如屈原、宋玉、黄歇、车胤、李群玉、柳拱辰、青文胜、龙膺、江盈科，以及刘禹锡、范仲淹、李白、杜甫、黄庭坚等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以善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我们开展树立良好的常德形象的活动，这一活动首先要求我们继承崇尚善德的传统。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当然要适应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对历史上曾产生一定影响的先进道德具有继承性。我们今天所要求培养的社会主义道德，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它与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青文胜尸谏所表现的赤诚为民的品格、龙膺请命为民的大无畏精神、柳拱辰不恋栈、明进退的风范，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是这些优良品德的继承和发展。

《芷兰春秋》选择的研究角度是可取的，作者无论是考察历史人物的活动还是风景名胜的形成及其发展，都集中地发掘其中的文化价值。如作品在考察中国常德诗墙的一幅壁画《题咏名贤图》中的部分名贤时，不仅写了他们在常德的活动、作品，更考

察了他们对常德传统文化的影响。李白、杜甫、黄庭坚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被贬谪夜郎，路经常德，写了《望木瓜山》诗，诗中有“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句。因为木瓜果实味酸，更增加了诗人的惆怅。常德旧志记载自李白吟诗之后，当地人出于对诗人的热爱，便不再栽种木瓜了，从此木瓜山便有名无实。李白创作的被称之为词的鼻祖的《菩萨蛮》，是北宋人魏泰在汉寿沧水驿楼的墙壁上发现的。杜甫晚年飘泊于常德，据传到过安乡、汉寿。杜甫写的《过洞庭湖》一诗，被刻碑立在汉寿湖中的沙洲上，北宋诗人黄庭坚发现辨认，得以流传。黄庭坚诗、词、书法俱佳，他曾专程游览常德，写下了《双松亭》诗、《水调歌头·桃源》词，还为石门蒙泉书名刻石。他从常德回江陵之后，又书写刘禹锡在常德创作的《经伏波神祠》诗。这篇作品成为黄庭坚的书法代表作，自古以来在书法界享有盛誉。诸如此类，说常德文化底蕴丰厚确实名不虚传。

作者写风景名胜，同样注重考察其文化价值。如作者介绍桃花源这一名胜的形成，说她既是陶渊明艺术构造的理想国，也是道教炼师精心营造的仙境，还是自古以来迁客骚人和名士用诗文装点的一座艺术殿堂，作者的这一分析既深刻又准确。再如写柳叶湖，作者没有花多少笔墨去描写湖光山色的美丽，而是侧重描写她的鲜为人知的人文景观。柳叶湖畔有北宋大散文家曾巩作记的归老桥、明荣王府捐资修建的七里桥、明太常侍正卿龙膺建的濂园，柳叶湖还是武昌首义领袖刘复基的家乡。作者以“柳侯明进退，南丰留佳作”、“荣府捐资建桥，王崇撰记颂功”、“龙膺请命为民，濂园风流千古”，以及“复基首义捐躯，英雄故里生辉”为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津市嘉山因孟姜女而驰名，作者更是集中考察了孟姜女这一故事的形成及其在沅澧流域的影响。常德的古文化正是由这一股股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

发掘和研究地方文化史，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往往只有群体才能胜任。应国斌同志的创作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且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仅收集和钻研了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虚心向熟悉地方史的一切行家求教。尤为可贵的是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绝不人云亦云。应国斌同志学识渊博，他的作品集文化、历史、文学于一炉。读者从中可以领略文学的魅力、历史的价值、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然，作者毕竟做的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加之他供职市文联，一般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书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史料也尚需进一步考证。同时，该书选题限于古代，而沅澧流域的近现代人文资料更加丰富，影响也非常重大和深远；况且即使古代，也限于篇幅或资料，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人和事。作者表示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写出续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这项工作，写出更有分量的著作来。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芷兰春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她不仅为宣传常德、扩大常德的知名度将起重要作用，尤其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本文作者为中共常德市委书记）

导 言

用“芷兰”代指沅、澧，典出自屈原的《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谪居朗州十年的唐代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熟悉沅澧文化，他写的《宴朗州见示澧州元郎中早秋赠作命同答》一诗中，就用“芷兰”代指沅澧，“邻境诸侯同舍郎，芷江兰浦恨无梁”。清人金圣叹在选批刘禹锡的这首诗时就明确指出首联“芷江兰浦”是指朗州、澧州，它们与连州“新固邻镜，旧又同舍”，“三州久忝同袍，而各限衣带，则以无梁为恨。”^①

“春秋”一词，据《辞源》解释，有六方面的含义，即：岁月，四季；谓年龄；古籍名；古编年史通称；时代名；谓褒贬。先秦吕不韦称他集门客所著《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我综采诸说。

我以“芷兰春秋”命名拙著，不敢奢望吕氏自诩其著作的功能，但确实想以此纵论古今发生在沅、澧流域有影响的人和事。开始创作时，我曾用“武陵人文考丛”作书名，越到后来越觉得似乎欠缺一点什么，故改为现名。不过，仔细推敲，认为二题可以互为表里，我的主观愿望是写一本沅澧流域古代传统文化研究

^① 《唐诗六百首》，团结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09页。

的专著。

(一)

创作此著的动机，要追溯到 1995 年年底常德市委在全市开展的“建立良好的常德形象”的活动。我参加有关理论研讨会，写了一篇文章《从“常德德山山有德”说开去——试论建立常德良好道德风尚形象》。文章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常德形象，就是社会公众对常德的总的评价和看法。因此，建立良好的常德形象，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的形象，也包括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形象。关于常德的经济形象，一般将其概括为“纺城、烟都、酒乡、粮仓”，这当然很有见地。那么精神文明方面的形象如何呢？我认为流传很广的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崇尚道德是常德人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要使这一传统发扬光大^①。

文中我把一个地方的形象区分为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多方面的形象，并照顾前几年关于常德形象的概括，不过将其限制在经济方面。但是，我仍然有倾向性的意见：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流传很广，毛泽东在 1956 年 6 月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曾经提及这则民谣。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常德人民不曾刻意宣传这则民谣，但其知名度远比我们今天说的“纺城、烟都、酒乡、粮仓”大得多。况且，关于经济形象的这类概括能否被世人接受，至少还要做许多工作。我曾听市委书记吴

^① 《常德社会科学》，1995 年第 4 期。

定宪同志说过，最近又听到张昌平市长也这样说，出外办事，苦于常德知名度不高，经常有人把“常德”误认为“承德。”我建议，尔后常德人，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在外地作自我介绍时，可以自豪地说，常德“就是‘常德德山山有德’那个‘常德’”，这是绝对不会被人误解的^①。

至此，我的观点很明确：树立常德良好形象，至关重要的是要发扬光荣传统，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形象。当时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加强人文伦理建设的重要性：

第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方面的原因，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包括深厚的、全面的人文方面的原因，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例外。按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新教倡导的勤俭、节欲和财富积累的创业责任感等伦理规范，是促进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积累得以实现的基本精神动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出现的文化背景及伦理条件是相当明显的，它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极“左”的路线，对社会主义文化和伦理的基本精神进行重新思考和解释，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包括市场经济本身进行重新评价，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的人文伦理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从现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种种负面影响的原因分析，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原因，也有一个人文伦理原因，即我国国民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质要求还存在着矛盾。主要表现，其一，新经济体制建设先行与大多数国民思想观念变革相

^① 《常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对滞后的矛盾，现实生活中的权本位观念、特权观念、人情观念就是其表现。其二，新体制在客观上赋予某些人以一定的自主权与他们的能力有限而难以正确行使其权力的矛盾。其三，新体制赋予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经营活动中以主体地位与他们的主体素质相对不高的矛盾。因此，当人们面对市场领域不平等竞争、欺诈行为、假冒伪劣，甚至以暴力强迫来实现交易等现象时，都会感叹“人的素质太差”。这种感叹足以说明人的素质对于建设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认识加强人文伦理建设的重要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市场经济的本质：人通过物来表现和实现，它揭示的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依赖关系，只在于对这种依赖关系是否自觉，前者为盲目依赖，而后者为自觉依赖。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这种物的依赖的自觉性，只是应该如此，不是必然如此。一般来说，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基本上仍然是不自觉的。当前，拜金主义泛起、个人主义盛行等现象就是例证。因此，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关键在于加强人文伦理建设。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义之邦”，向来重视人文伦理建设。早在春秋时代，就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说。孔孟更认为“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虽不免偏颇，但仍不失精华。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① 孟子宣扬“天爵”、“良贵”思想，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

^① 《论语·里仁》。

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①又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②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这是天赋的，不可剥夺。人世间爵位之贵都是当权者给的，那是可以剥夺的。这固有的“天爵”、“良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品质。王充的论述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夫德不可独立治国，力不可以直任以御敌也。”^③一方面要尊崇道德，一方面要培植实力，两者不可偏废。

当时我还有一个观点，认为道德滑坡是一个严峻的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正确的态度不是否认和掩盖这一现实，而是要正视这一现实，并且用改革进取的精神去改变这一现实。

众所周知，“常德德山山有德”源于人有德。相传远古时代这里曾居住过一位与尧舜禹齐名的善卷先生，是他开化“枉人”，使其知礼义，明事理，受人爱戴。隋时嵩州（即今常德）太守樊子盖将善卷居住过的枉人山改名善德山，简称德山。可见，崇尚道德在常德渊源流长，善卷先生是有文字记载的源头。在常德历史上德行高蹈的还有屈原、宋玉、车胤、黄歇、李白、杜甫、刘禹锡、李群玉、范仲淹、江盈科等人，他们或出生常德，或游历常德，都以自己的品德和行为对常德的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此，我决定写一本书，以善德为主线，考证和介绍古代发生在沅澧流域有影响的人和事，不仅仅是为了宣传常德，而且希望能以史为鉴，促进道德风尚以至整个精神文明的建设。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孟子·告子上》。

③ 王充：《论衡》。

(二)

屈原用文学语言“沅有芷兮澧有兰”描绘沅澧形象，“芷兰”虽为芳草，但它还有更深的蕴涵。远古的善卷先生以自己的言行，早把这种蕴涵具体化为善和德。本书选材范围，限于古代发生在沅澧流域有影响的人和事，但是，研究中所涉及的有关人文资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我可以说本书虽为沅澧流域文化研究专著，且不说沅澧流域古文化是楚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从其涉及的内容来说，阅读对象也并不限于常德。诸如屈、宋、李、杜在常德的活动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的意义还是阅读对象都超出了沅、澧流域的范围。从时间范围来说，一般截止于明清，有些文章因特殊原因顺延到现代。这样做完全是因受篇幅限制而定。

全书包括名贤、名宦、名僧、名胜四篇。它们在内容上既有分工，又无绝对界限，相互之间有交叉，但我尽可能避免重复。通过这样四篇文章介绍沅澧古代文化肯定很不全面，况且笔者也无意构造一个体系，只想使我考察的有影响的人和事稍有次序而已。比如名僧篇，原本想拟为宗教篇，但因其中道教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其他篇章中，而诸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本人来不及研究和考察，故只限于佛教，并且只限于佛教的禅宗，若有机会我愿意写一本关于沅澧流域宗教文化研究的著作。

关于“名贤篇”。所谓“名贤”，就是有影响的德才兼备的人。书中论及的名贤，基本上都是名士，并且也同时是名宦。为了与名宦相区别，我借用孟子的一段话作标准，即上文已提到的《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话。他区分“天爵”和“人爵”。所谓“天爵”，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也就是今天说的品行高尚

者。而“人爵”，指公卿大夫，即人为的授予的官职。当然，很多人二者兼而有之，既有一定职位，又同时品行高洁，受人称道。于是我又运用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的“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本书考察的“名贤”基本上是“常贤”，但却无常遇，不少人很不得志，屈、宋、李、杜，以及常德籍的李群玉、江盈科等人均属此类。经过这样两番界定，“名贤”的指谓基本上是明确的。

列入名贤进行系统考察的有六位，即善卷、屈原、宋玉、刘禹锡、李群玉、江盈科。善卷是传说中的上古人物，他是沅澧流域的先祖，是他树起了常德崇尚道德风尚的形象。常德位于湘西北，虽为古文明最早的发祥之地，但因洪水之灾，可能曾出现文明中断期^①。因此，历史上有蛮荒之称，加之少数民族聚居，难免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所以，崇尚道德在沅澧流域显得特别重要。关于地方命名就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比如历史上此地曾命名“武陵”，晋代潘京就解释说：“郾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出，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为陵’，于是名焉。”^②据考证，潘京说法有不确之处。常德不曾命名义陵，以“武陵”名郡是在西汉。但是潘京所解释的武陵命名的用意是明确的，武陵实为止戈平安之义。北宋政和七年（1117）改鼎州为常德郡，其“常德”取义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遣将帅，修戒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以为法，是有常德也。”^③

① 历史学家俞伟超说：在夏朝建立以前，长江流域文明因为有史记载的大洪水泛滥而中断，直隔了一千多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又重新发达起来。

② 伍顺生主编：《常德风物大观》，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③ 同上。

同样希望修戒兵戎，人民安居乐业。善卷先生的品行体现了这种希望。

在文学史上屈宋并称。据有关专家考证，屈原的出生地在常德的汉寿县；而宋玉的封地和他晚年的流放地及葬地均在常德的临澧县。名贤篇考证了屈原第二次流放在沅澧之滨的时间、地点及其影响。《宋玉终于临澧县考》对于历史一直认为宋玉“不知所终”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对于沅澧文化的形成，屈宋两位先贤作出了重要贡献。屈宋创造的楚辞是南方的一面旗帜，由于“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深厚得多，因此它成为文学的主干”^①，李泽厚甚至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②。可见，沅澧流域在中国古文化形成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刘禹锡不是常德人，但他在唐“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为朗州司马十年。这十年，他虽然政治失意，无法有所建树，但在其他方面却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热爱常德，感慨“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他发掘常德古文化，推介桃花源，创造民歌体诗歌，参与韩愈、柳宗元之间的哲学大论战，创作哲学名著《天论》。刘禹锡在常德十年，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地位。将刘禹锡列为名宦未尚不可，但根据其在常德活动的性质，我认为将他列为名贤更妥切些。况且终其一生，刘禹锡并未走出受排挤的政治阴影。

晚唐诗人李群玉、明代公安派文学家江盈科都是常德人。李群玉才识过人，本无心仕宦，仅因大诗人杜牧的规劝，勉强赴举；后因受宰辅裴休及令狐绹等人推介，向皇帝献诗，获校书郎一职，但不久离任。因此，终其一生基本上以吟诗为业。李群玉

① 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社1984年版。

是湖南走向全国的唐代大诗人之一。江盈科自中进士后虽然一直为宦，但他的主要成就仍在诗文方面，他与袁宏道一道创造公安派文学，世有“袁江”之称。袁宏道是主将，江盈科是副将，但正如陈蒲清先生所说，江氏有两点超过袁氏兄弟：第一，袁氏小品直抒性灵，个性突出，但涉及国计民生者较少；江氏诗文则大多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发论精警，具有大家风范。第二，袁氏虽推崇通俗文学，但无创作实践；江氏则力求理论与创作相结合，在寓言和笑话创作上成绩突出^①。

著名国画家陈白一和陈明大先生为常德诗墙画了一幅壁画《题咏名贤图》，选绘了从先秦至清末的28位中国古代名贤，他们或到过或出生于常德，都写有弥足珍贵的有关武陵的诗词佳作。其中有大部分名贤的事迹散见于我的文章之中，在“名贤篇”我对另外9位作了专门考证。他们是沈约、阴铿、李白、杜甫、黄庭坚、张孝祥、姜夔、秋瑾、林则徐。

关于名宦篇。旧志均列此篇目。《直隶澧州志》从老百姓的评价的角度界定“名宦”，指因其德、才及处事能力被人民称赞为“父母”、“神君”和“青天”的郡守和县令。而《常德府志》则立足于官吏本身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并概括这些表现为对老百姓“慈惠”、施政处事“刚毅”以及为政“廉介”。虽然我完全赞成两志的界定，但笔者考察和介绍的“名宦”则为古代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官吏，既包括外地来常德任职的，也包括本地去外地任职的人，其影响既有被历史承认或人民好评的，也包括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此，列入本篇的有楚国的名相春申君、东晋名臣车胤、北宋的改革家范仲淹，也有明末崇祯帝的宰辅杨嗣昌，还介绍了明代就封常德和澧州两地的荣王府和华阳王府的诸位藩

^① 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岳麓书社1997年4月版，第8页。

王。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我还将南宋时领导洞庭湖区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钟相、杨太，也列入名宦的行列。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是著名的政治家；而杨太领导军事斗争，抗击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名将，堪称卓越的军事家，列入“名宦”，当之无愧。

篇首的《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系统地介绍自秦汉以来在常德任职的著名的州官、府官和县官。著名的州府长官有东汉的应奉、陆康；三国的黄盖、钟离牧；晋代的应詹；南朝的谢晦、刘俊；隋朝的樊子盖；唐朝有李泌、李元则、胡处立、李璡、崔嗣业、李翱、温造等人；两宋有李焘、周必大、袁申儒；元代有倪德政、哈珊；明朝有应履平、杨宣、方仕、管宗泰；清代有何璘等人。文中还介绍了明代的两位著名县官，一是任安乡县令的谢正蒙；还有一位是龙阳典史青文胜。

太史公只说“春申君者，楚人也”，其籍贯究竟在哪里，无考。但是，古武陵不仅有春申君墓，而且还因他养士三千，有为士制做珠履并由此命名的珠履坊，历代名士凭吊这位名相的诗赋很多。据此，笔者对黄歇的籍贯作了一些考证，对他的事迹作了介绍。

车胤是东晋名臣，他是南平人。安乡曾几度为南平治所。车胤是常德人确信无疑，但是否就是常德的安乡人却引起了争论。当时，澧县以及今天的津市也属南平，尤其是津市，关于车胤的古迹不少，有车城、车胤墓、囊萤台，在临澧还有车公的读书台。车胤是名臣，身处乱世，有自己做人、做臣的准则，历史给予了好评；而他“囊萤夜读”的精神更激励一代代学子奋发进取。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散文《岳阳楼记》在文坛上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